

中国古代“治国”理论与现代综合国力分析

夏立平 许 嘉

综合国力分析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管子学说中关于“国力”的思想,挖掘中国古代

文化的宝贵遗产,吸收其精华,使之古为今用。

一、国内外关于综合国力分析理论研究的现状

现代西方学者对综合国力的研究起步较早。他们对国家力量基本要素的分析为人们研究一国国力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根据其观点可分为三个学派。

1. 定性分析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雷蒙·阿隆和汉斯·摩根索。雷蒙·阿隆把国家力量归结为三大基本要素:A.所占据的地理空间;B.资源(包括物质和人力);C.集体行动能力,涉及到军事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等。^①汉斯·摩根索则认为国家力量的构成主

要取决于9大要素: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状况、人口、民族特性、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②

2. 定量分析学派,又称为行为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没有把国家实力中的各种因素进行分解、量化,而没有量化的概念便不准确,不科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卡尔·多伊奇和史蒂文·布拉姆斯。卡尔·多伊奇在他的《国际关系分析》一书中提出了“权力份量”的观点,并用这种观点研究

2. 信用证合同与开证委托代理合同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确立了开证申请人和开证行之间的关系是开证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之后,我们再来考查它与信用证合同的关系。开证委托代理合同不成立,开证行就不会开证,信用证合同就无法成立和履行;开证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上有缺陷,就可能影响到信用证合同的成立。例如,开证委托代理合同中未规定信用证的有效期,故开证行所开出的无效期的信用证是无效的,进而,信用证合同是不成立的。从信用证支付关系的法律框架上看,开证委托代理合同是介于买卖合同和信用证合同之间的桥梁,也是达成信用证合同的必经程序;从内容上看开证委托代理合同应是信用证合同的基础和依据。

注:

① 通知行与开证行之间是代理关系。该观点请见《国际贸易结算》,戚世忠等编著,第79页。

② 该观点请见施米托夫的《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的法律与实务》,第310页。

国家力量。他认为,如果在某一时间内,美国在联合国所支持的提案平均有75%可以得到通过,而同时美国不支持的提案只有25%能够通过。这说明美国的支持可使提案获得通过的机会从25%增加到75%,即增加了50%。这50个百分点就可以代表美国此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权力份量”。^③

史蒂文·布拉姆斯依据交往关系对权力及影响力进行了测量。他认为,个人、团体或国家收到并接受访问邀请的次数比发出访问邀请的次数越多,它们对其他实体施加影响的能力就越大。假如两国之间的交往大致相等,两者互为影响的关系则为对称。如果一国收到并接受访问邀请的次数,特别是官方访问的次数大大超过了对方,该国则对对方施加了不对称的影响。^④

3. 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乔治敦大学的克莱因。他把力量要素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综合力量公式,又称“克莱因公式”。

$$P_p = (C + E + M) \times (S + W) \quad \text{即: 国家力量} = [(\text{人口} + \text{领土}) + \text{经济能力} + \text{军事能力}]$$

$\times (\text{战略意图} + \text{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 ^⑤

我国国际政治理论界在综合国力研究方面虽然起步晚,但也已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在衡量一国的综合国力时,专家们提出,不仅要进行定量分析,而且还要有定性分析。他们认为,一国的综合国力既包括该国地理、人口、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组织能力、外交能力、国民意志、战略意图等物质和精神要素,又包括一国在国际斗争中国家行为的性质。当一国的国家行为代表正义、进步的方向时,就会赢得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持。反之,一国的国力将会被国家行为的反动落后性所削弱。

军事科学院黄硕风研究员还提出了综合国力的动态方程:

$$P(t) = K(t) \times H(t) \times S(t)$$

t表示时间;P(t)表示某一时间的综合国力;K(t)表示协调系数;H(t)表示“硬件”,它由人口、国土、科技力量、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组成;S(t)表示“软件”,它由战略目标、领导体制和国民意志构成。^⑥

该公式的提出把我国关于综合国力的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管子关于“国力”的思想

管子,即管仲,我国春秋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当时,诸侯各国在周王朝衰落的情况下各自为政,都想在列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国家力量”,享有更大的影响力。其政治形势之复杂、各诸侯国之间竞争之激烈并不亚于当今的国际社会。在这种形势下,管子辅佐齐桓公,仅用几年时间就使原国力不强、内乱频频的齐国面貌一新、实力大增,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与此同时,管子系统地提出并成功地实施了关于“国力”的思想。我们研究管子思想可以为现在开展综合国力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管子关于“国力”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将

教育、理财、治兵作为增强国力的三大纲领,而将治人作为这三大纲领的根本。管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一国之民为治国之本”。那么如何治人呢?管子认为治人主要是提高人的素质。管子提出:“事大功效自小始”。^⑦即一个国家大业的成功必须从基本的东西,包括从教育做起。管子所说的教育,不仅仅是指文化教育,更重要的是用“礼”与“法”来教育人。“礼”规范人的行为准则,重在提高觉悟和养成习惯。“法”申明禁惩律条,重在警戒民心。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教育,对于强化国家的凝聚力,统一国民意志显然是有效的手段。而国民意志的统一程度对国家力量的

强弱至关重要。历史上有许多小国打败大国的事例,除其他各种原因外,国民意志的统一程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礼”与“法”能否真正化为人的自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国家政策正确与否有关。为此,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思想。^⑧管子这些启人心智的见解,特别是他在增强国家力量中重视提高人的素质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研究综合国力理论仍很有参考价值。

管子不仅重视国家力量中人的因素,而且也认识到国家力量中各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管子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⑨在人、经济、军事三者当中,管子把人放在了首位。这再次体现了他对人的重视。

理财,即发展经济,是管子治国的又一重要内容。管子衡量一国的贫富,不是以金银的多少为标准,而是以生产力的高低为依据。管子指出:“时货不道,金玉虽多,谓之贫困也。”“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荡身。”^⑩可见管子经济思想的深刻。

管子有关经济与人和军事关系的见解也很精辟。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⑪因为,“民贫则散亡不能禁,民贫则教育不能施,民贫则法令不能行。而此三者又递相因果,蝉联而至”。^⑫这里,管子看到了经济对人的素质、国民意志的影响。国家富强、经济繁荣,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人丁兴旺;才能教育发达,政令畅通。管子还熟谙经济对

军事的影响。他担任齐国宰相期间,外交和军事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商战而不以兵战,即用经济手段对别国施加影响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梁启超在评价管子对外政策时说:“然管子之制天下也,以商战而不以兵战,故观各国上下所贵好为其最要之手段。”^⑬管子还指出:“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变化,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也。”^⑭这种论述经济对军事重要性的言论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

管子有许多杰出的军事思想,是我国军事思想史的宝贵财富。其“为兵之数”往往不局限于就军事而谈军事,而是全面地研究思考问题。在《管子·七法篇》中,管子说:“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聚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入。是以欲正天下者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⑮这段精彩的论述使我们再次体会到管子用兵“非待战而后屈人”的思想,同时也看到管子是把军事力量放入国家力量的整体当中来加以考察的。这种辩证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系统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管子学说对综合国力理论研究的启迪

管子的“国力”思想虽然产生于2600多年前,但对我们今天研究综合国力理论仍有很大的启迪。

首先,管子将财富、工艺、武器(器械)、人的素质和任用、政教、军事训练、通晓外部世

界的程度、谋略及其运用作为国家力量的八大要素,这实际上已是一种早期的综合国力思想。

第二,管子明确提出了增强国力的三大纲领:教育、理财、治兵。此三者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重点突出、切中要害。而且,管子把人作为国家力量之本。他既没有仅仅谈人口数量的多少,也不是泛泛而论民族特性或国民士气,而是从最实质、最根本的方面谈起——强调人的教育、人的素质。联系到今天的国际斗争,这种思想的深刻性越发显示出来。虽然人口众多、领土广阔对一国的国家力量有益,但如果只重视人的数量,忽视人的素质,不仅不能带来国力的增强,相反还会削弱国家力量。人的素质低和缺乏凝聚力,国家经济难以上去,政府质量不会很高,军事实力也不可能很强,甚至出现人多却被欺侮、自然资源丰富却被掠夺的情况。这是反复被历史所证实的道理。因此,管子在分析国家力量时选择了从人的素质入手,确是很有眼光的。而现在西方学者关于综合国力的理论中,似乎还未能从如此高的角度认识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性。

第三,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在研究国家力量时,大多把国家力量中的各个要素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而不够注意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即使是克莱因公式和黄硕风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也未能全面地反映出

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公式虽然把国家的硬件(如:人口、领土、经济和科技)和精神要素(如:战略意图、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战略目标及国民意志)的关系用乘数关系表示,以说明后者对前者的重要作用。当精神要素等于零时,其与硬件的乘积也就为零。但是,在硬件当中,人对经济的影响、与军事的关系;经济对人的影响;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等均未能反映出来。而管子思想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在管子的分析当中,人、经济、军事三者应当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即:人 $\leftrightarrow$ 经济和军事、经济 $\leftrightarrow$ 人和军事、军事 $\leftrightarrow$ 人和经济。如果把管子的国家力量分析也写成动态公式的话,则对我们今天研究和发展综合国力颇有启迪,它应当是:

$$P(t) = \text{人}(t) \times \text{经济和科技}(t) \times \text{军事}(t)$$

这里P表示综合国力,t表示时间的变化。人、经济和科技、军事这三者由原来“+”的关系改为“ $\times$ ”的关系。这样就更明确地反映出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彼此关连的关系。一要素变化,其他要素也随之变化,一统三分,三分一统,在高度简洁明了之中寓有丰富的动态变化。

注释:

①②③④⑤ 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48页、49页、101页、50页。

⑥ 《世界知识》杂志,1987年第24期。

⑦⑧ 《管子·霸言篇》(《诸子集成》卷五)。

⑧ 《管子·牧民篇》。

⑩ 《管子·八观篇》。

⑪ 《管子·治国篇》。

⑫⑬ 梁启超:《管子评传》,载《诸子集成》卷五,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5页、64页。

⑭ 《管子·兵法篇》。

⑮ 《管子·七法篇》。